

## 两会观察

## 以教育数字化战略释放教育变革强大势能

钟柏昌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数字教育。全国两会期间,教育数字化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自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施以来,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教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两年,我国在公共数字教育资源的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了跨越式发展,越来越多的优质资源正在突破时空、联通城乡、跨越山海,以教育公平增进社会正义。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教育为何、教育何为,已成为世界关注的时代命题。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也高度关注教育数字化转型,纷纷把数字教育作为应对危机挑战、开启光明未来的重要举措。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不仅可以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也是营造终身学习环境、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核心力量,还可以提升青少年数字素养和壮大教育科技市场,反哺我国信息科技产业发展,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实现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教育图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有战略定力和战略执行力,持续释放教育数字化变革教育的强大势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数字化转型将贯穿教育改革的始终。那么,如何才能有效释放教育数字化变革教育的强大势能?

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兼顾短期效果和长远目标,做到精准教学和素养提升相融合。近两年,教育数字化在赋能精准教学、提升教学效果、实现减负增效方面产生了积极成果,成为许多学校提升学生学业成绩的利器。诚然,学习效率和成绩的提升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教育作为百年树人,始终要面向全人发展、实施五育并举的活动,需要注入更多的教育价值。

教育数字化转型要以人的长远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学生的兴趣激发、能力培养、情感交流、素质提升和价值塑造融为一体。要引导辩证看待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在数字化生存环境中学会学习、学会共处、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培养师生高效率、负责任、重规范、合情理地运用数字技术的自觉性。教师要在传承与创新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润育一代代立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时代新人。

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实现上下联动和头尾相顾,做到校长引领和科组应用相配合。数字化转型如何真正进入校园、深入课堂,形成数字化转型的惯性和习惯,既需要学校层面的统筹规划,还需要基层科组的深度参与。学校管理者,尤其是校长或分管教育数字化的副校长,最了解学校数字化转型的整

体布局和现实困境。他们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认识态度、筹划能力和支持力度决定了这项工作的成败。因此,在学校数字化转型中,校长的教育数字化领导力是关键,必须重视培养校长的教育数字化领导力。

科组是年级组、教研组(学科大组)和学科组(年级备课组、学科小组)三类纵横交叉的基层单位的统称。数字化赋能教学改革,最终都要落到每位教师身上。科组是有组织地开展教研的最小单元,也是最灵活的数字化转型先锋。把一个或多个科组打造成数字化转型的样板间,就能影响更多的教师,最终实现整校推进。如同社区治理的网格模式一样,围绕科组来设计数字化转型的具体任务和计划,压实科组数字化转型的制度化权力和责任,提升科组的数字化教学能力,实现重心下沉和工作下沉,以此形成靶向思维,减少目标漂移。

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强化原创研究和学科建设,做到理论研究与集成应用相结合。开物成务,才能笃学敏行。高质量的数字教育实践离不开深度的理论探索。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加强了教育数字化相关的理论研究,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诸多共识。未来,不仅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吸收全球数字教育治理经验与研究成果,更要加强人工智能与教育交叉融合的学理研究,建构具有时代特

色和本土意蕴的数字教育自主知识体系,乃至建立数字教育或数智教育交叉学科。

教育数字化转型坚持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简洁高效、安全运行。这一行动纲领具有丰富的内涵,离不开集成化应用这根弦。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成,一个成功经验就在于坚持系统集成,使之成为资源富矿和服务高地。只有通过系统集成,才能汇集丰富的优质资源,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只有通过系统集成,才能提供快速反馈和敏捷服务;只有通过系统集成,才能统一入口、统一搜索,实现简洁高效的运作;只有通过系统集成,采用统一的身份认证和内容溯源,才能确保安全运行。

展望未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还可以进一步增强特色教育资源的集成。例如,包含各类教学素材的单一课例、单元课例、项目课例的资源包,开源课件、开源数据集等开放资源,STEM和跨学科教育资源,以及接入国产大语言模型,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交互生成和个性化供给。

如是,大力发展数字教育,进一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将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磅礴力量,锻造数字教育的本土道路、中国模式和国际品牌。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



全国政协委员任少波:  
勇于担当,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

厚植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自主”沃土

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着眼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选择。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硬核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样如此,决不能等、要、靠。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自主能力建设,是检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试金石。近年来,高校在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注重科研育人和大师引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多种培养模式。未来,还需要立足全球视野,总结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深化改革,探索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中国方案。总之,自主培养方能赢得主动权。厚植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沃土,才能让有潜质的好苗子尽快冒出来。

(本报评论员 郑迦)

全国人大代表雷军:  
在义务教育阶段普及人工智能素养教育

加快推进中小学  
人工智能教育

人工智能正掀起新一轮科技浪潮,悄然改变着社会形态。未来不仅各行各业需要大量的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每个人也都要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素养,以应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因此,在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很有必要。

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名单,184所学校入选。这表明国家已经在探索义务教育阶段的人工智能教育。普及性的教育课程必须建立在成熟的经验上。教师力量怎么配备?课程内容如何设计?实验环境如何建设?这些都亟待形成可以普及推广的做法,以实现更多学生接受人工智能教育。因此,各基地校重任在肩,需要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区域人工智能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以各基地校的实践探索为起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有望在更大范围内普及。

(本报评论员 刘钰)

全国政协委员冯远征:  
马面裙等传统服饰火起来,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的探索

吸引年轻人  
爱上传统文化

年轻人亲近并身体力行展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让人欣喜的好事。无论是马面裙,还是地方戏曲,都折射出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也反映出当年轻人对美的强烈需求。其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可以装点、美化生活,也可以表现个性,增强文化上的认同感。因此,鼓励年轻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善用网络渠道和技术手段对之予以创新传播,能让更大范围的群体拥有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老旧过时,而且具有巨大的时代魅力,在新兴的传媒手段或社交方式的支持下甚至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乐见传统文化与年轻人紧密联结起来,涵养他们的审美观、人生观,使其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言人。

(本报评论员 张贵勇)

全国政协委员洪明基:  
全面禁止未成年人网游

## 防止网游沉迷应疏堵结合

沉迷网游对未成年人危害巨大,不仅有害身体、耽误学业,也不利于心理发展和人格健全。但防止孩子对网游依赖成瘾,不仅要靠堵,更重要的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引导孩子懂网、知网、善用网,真正做网络的小主人。

一方面,网游企业和平台要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严格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国家的要求,落实防沉迷规则机制,改进防沉迷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家校社协同合作开展好防沉迷教育。家庭要从学前阶段开始逐步培养孩子的网络使用自控力,培养孩子多方面的兴趣爱好,引导孩子懂网、知网、善用网,真正做网络的小主人。同时,基层科研组织有必要在真正领会上级减负行动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作,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张力,使基层权力能够在制约和监督的环境下顺利运行。

青年科技人员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支撑。关心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切实减轻青年科技人员的负担,需要国家层面的减负行动能够真正落地。

(作者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 两会漫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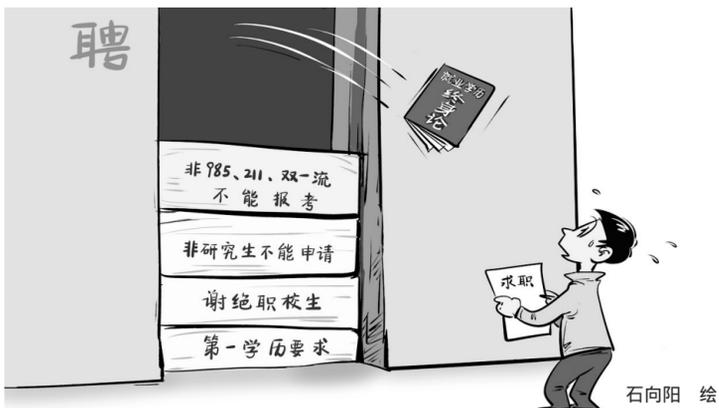
## 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消除“第一学历”歧视

任然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潘复生关于破除研究生招生就业唯学校出身论的建议受到热议。其实,第一学历本身是个伪概念。教育部曾明确指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并没有“第一学历”的概念。但现实中,不少人在求职、升学过程中都反映遇到因“第一学历”而被区别对待的现象。有网友甚至自嘲,第一学历不好,就像留了案底。

就现实来看,第一学历歧视,除了因为一些招聘、招生单位出于提升筛选效率的考量,本质上还是“唯文凭”倾向的一种升级。因为其对应的很大一部分现实动机是,既然同等学历条件下不足以评价应聘者,那么就去评价其第一学历,那么就追溯到第一学历去评价。这归根结底,还是“唯学校”“唯文凭”的变种。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要求,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这针对的就是评价体系过于单一,过度依赖于分数、文凭等指标的现象。而一些单位和学校在招聘、招生中,从过于看重学历到过度筛选“第一学历”,与人才培



石向阳 绘

养阶段的评价容易落到学历和文凭上,已然形成了一种呼应。

因此,思考如何消除“第一学历”歧视,就必须进一步追问,用人单位和学校在招聘、招生中,除了看学历,还能够通过哪些方式去更多了解人才的综合能力?学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除了通过最终的文凭和学历去评价学生,还有没有其他的评价体系和指标?这方面,《方案》其实已给出了明确的指引。例如,

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深化研究生考试招生改革,加强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考查,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推动多种形式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实现不同类型教育、学历与非学历教育、校内与校外教育之间互通衔接等。

当上述综合评价体系能够进一步改善,无论是用人单位招聘,还是高校招生,都有望在更多维度公平公正地掌握和评价人才的综

## 两会热评

建好师资队伍  
提升青少年法治教育水平

任海清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青少年法治教育问题受到关注。例如,全国人大代表李秋建议,用专业化法律课堂助力青少年成长。中小学法治教育工作中,教师是关键,未来还需要在法治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上多下功夫。

大力提升中小小学校内法治教师队伍的专业水平。目前,中小小学校内法治教师具有法学背景的人数不多。近期目标可聚焦于加强在职教师的系统培训。培训内容既要重视教学方法,更要加大系统法律知识的比重。从长远目标来看,需要加强高校对法治教师的培养。一些高校的探索实践具有推广价值。比如,有的师范类高校已经开设了道德与法治本科专业,还有的师范类高校在研究生层面设立了思想政治教育(法治教育)方向,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法学院共同培养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很多进入中小学担任法治教师。这些做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必要性。

提升法治教师专业水平,还应当提升法治教师的获得感。《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规定,通过多种途径,保证每所中小学至少有1名受过专业培养或者经过专门培训,可以胜任法治教育任务的教师。因此,应该在每所中小学至少设置一个法治教师岗位,并且在晋升通道上有与其他学科岗位教师同等的待遇,以此引导更多在职教师积极成为一名合格的法治专任教师。

更好发挥校外法治师资队伍的作用。法

治教育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而中小学校的校内师资专业短期内可能无法全面提高,因此需要更加充分地发挥校外师资团队的力量。目前,绝大多数中小学都配备了法治副校长,他们可以定期到学校开设法治讲座,但是这还不够。从调研情况来看,法治副校长每年可能只来学校1-2次,不能充分满足学校法治教育的需求。实践中,已经有法学院校在中小学建立实践基地,并定期派遣师生到学校开展有规律的法治教育活动。律师的力量同样值得重视,有的学校邀请律师团队到中小学进行常规性法治教育授课或者指导实践活动。这些做法都值得推广并予以支持。因此,高校要大力支持法学专业的学生到中小学参与法治教育工作。律师行业有法律援助或者服务社会的职业要求,也应该将律师进校园参与法治教育工作作为评价律师的重要指标。

大力发展高校法治教育学科的师资队伍。目前,高校中专门研究法治教育专业的教师比较少,应该鼓励高校尤其是师范类院校、政法类院校,大力发展法治教育学科,培养法治教育教师队伍。高校中研究法治教育专业的专家学者,可以编写更多符合中小学法治教育实际的案例分析、教学辅导用书,探索设计更多有价值的法治教育实践课程,从而为法治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此外,法治教育的科学评价方法与路径也值得加强研究,以提升法治教育的实效。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减轻青年科技人员负担  
亟须真正落地

高耀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袁亚湘呼吁减轻青年科技人员负担。该建议引起许多科技工作者的共鸣,也得到了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为青年科技人员减负的议题早就进入了政府关注的视野,并已出台了相关政策举措。但从实际调研情况来看,政策尚未完全落到实处,从政策的出台到政策的真正落地还有一定的距离。青年科技人员负担过重,科研工作之外的杂事太多,面临的各种考核、评估评比、事务性而非科研性的工作依然较为繁重。这不仅会挤压正常的科研工作时间,而且会对青年科技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潜在或现实的不利影响。

现实中,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主要从事科研工作的单位或组织中,青年科技人员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核要求。除了日常的科研工作之外,他们往往还需要兼职承担不同的行政性或事务性的服务性工作。个别基层组织甚至出台自己的政策规定,将青年科技人员承担的综合服务性、行政性或事务性工作纳入考核范畴,与其职业晋升和绩效考核等进行关联。青年科技人员刚步入新的单位,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承担较为繁重的服务性工作,这似乎已成为不少基层学术组织的潜规则。

在个别单位或基层组织的考核、评比、职业晋升等标准和环节中,青年科技人员还

可能被区别对待,形成较为明显的“新人老人”的区隔。凡此种种,不仅会对青年科技人员的科研热情、职业志趣和职业尊严造成负面影响,也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科研文化氛围。

科研工作是一种独特的智力劳动,有其自身的逻辑规律。科研人员科研兴趣和科研动力的激发需要营造良好的科研文化氛围和环境,这种氛围和环境不仅包括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宏观大环境,还包括基层单位和组织的微观小环境,而且这种微观小环境尤其重要。

从根本上来看,切实减轻青年科技人员负担过重的问题,首先需要厘清不同工作性质之间的边界,边界清晰才能职能明确。青年科技人员是我国科技战线的主力军,也是我国科技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厘清科研工作、行政工作及事务性工作的边界是首要之务,从而为青年科技人员心无旁骛从事科研工作留出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在厘清不同工作性质边界的同时,基层科研组织有必要在真正领会上级减负行动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作,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张力,使基层权力能够在制约和监督的环境下顺利运行。

青年科技人员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支撑。关心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切实减轻青年科技人员的负担,需要国家层面的减负行动能够真正落地。

(作者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